

# 重释《资本论》语境中的抽象方法

鲍金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标识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来看, 作为把握“经济形式”的纯粹本质的思维方法, 抽象方法不是体现在《资本论》的商品分析中, 而是典型地体现在《资本论》关于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基于对商品价值的分析, 马克思对源自古典经济学的“具体上升到抽象”进行了改造和推进, 才真正实现了科学意义上的抽象方法。这一方法的“正确性”, 还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这一批判性继承表明, “具体上升到抽象”有待于提升和深化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探讨《资本论》抽象方法的内涵及意蕴, 对于从方法论视角来深化《资本论》研究, 夯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方法支撑, 为科学认识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提供理论借鉴,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资本论》; 抽象方法; 抽象上升到具体; 具体上升到抽象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3)04-0023-08

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乃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前的一个思想任务是: 如何理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标识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 “抽象”方法既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结果, 也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点。那么这个结果和起点是否在“抽象”方法上是同一的呢? 进而言之, 作为《资本论》正文起点的商品分析, 是不是承载着《资本论》中“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方法? “抽象上升到具体”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论关系是怎样的? 前者的正确性是否意味着后者是不正确的? 针对上述问题, 有学者认为“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具体上升到抽象”是矛盾的次要方面<sup>[1](113)</sup>; 有学者指出, “具体上升到抽象”是前提和基础, “抽象上升到具体”则蕴含着“具

体上升到抽象”<sup>[2]</sup>;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 紧接着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由此, 两种方法中的“抽象”就是同一个抽象<sup>[3]</sup>。我们认为, 两种方法的矛盾主次说混淆了方法的理论地位与方法的客观性质; 蕴含关系说还停留在原则性层面, 需要更加细致地揭示出两种方法的关系在实质上是怎样的; 两种“抽象”方法的同一说则未能结合《资本论》语境, 对抽象的真正体现之处做出全面考察。不难看出, 学界对《资本论》抽象方法问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模糊之处。

鉴于此, 我们将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重新解释《资本论》的抽象方法, 揭示《资本论》抽象方法的真实内涵及意蕴, 为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 以及科学认识作为重要生产

收稿日期: 2023-01-06; 修回日期: 2023-05-09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智能技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22AZD062)

作者简介: 鲍金, 男, 山东潍坊人,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理论和《资本论》哲学, 联系邮箱: maodundunmao@163.com

要素的资本这一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提供方法论的参考依据。

## 一、抽象方法的体现:《资本论》的分析起点与方法起点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首句便将商品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起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sup>[4](47)</sup>这一做法似乎明白无误地表明,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是以商品分析作为起点的。应当说,这一论断有着马克思文本的直接支持,大致是正确的。然而,这一论断仍然需要深入分析。在作为《资本论》第一个手稿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sup>[5](42)</sup>。作为这一方法之起点的抽象方法,马克思指出,它既不是显微镜,也不是化学试剂,而是分析经济形式的不可取代的方法<sup>[4](8)</sup>。现在的问题是:将作为《资本论》之分析起点的商品分析和作为《资本论》之方法起点的抽象方法放在一起比较,前者能不能体现出后者呢?换言之,作为《资本论》正文起点的商品分析,是不是承载着《资本论》“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中的抽象方法呢?我们看到,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资本论》的起点问题提出了卓有见地的判断。多数学者主要是从《资本论》的体系结构或理论内容的角度来作出判断的,还鲜有学者从方法论角度,即将作为《资本论》之分析起点的商品分析与作为《资本论》之方法起点的抽象方法问题贯通起来进行思考,本文尝试弥补这一方法论的缺环。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方法是从众多具体事物中抽取共同的、本质的规定性,如人们在见到具体的桌子、具体的人等众多具体事物的基础上,慢慢形成了桌子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旦具备抽象的概念认识,人们就可以把握桌子

成为桌子的本质规定、张三成为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方法同样是从众多“经济形式”中抽取共同的、本质的规定性,从而表现出与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方法相似的方面。然而,两者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区别,这一区别是我们科学把握《资本论》抽象方法的关键。具体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抽象方法往往是和事物的属性、状态、特征等“具体”的规定性结合在一起的,即抽象与具体相结合,如人们往往在把握桌子概念的同时也会联想到桌子的形状、颜色、位置等具体的规定性,在认识到张三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同时也会想到张三的性格、爱好、品行等具体的规定性。但是,《资本论》的抽象方法则是在思维中“舍弃”众多“经济形式”的具体规定性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的,即抽象“代替”具体。马克思对《资本论》抽象方法这一特征的阐述非常明确:“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sup>[4](8)</sup>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显微镜”和“化学试剂”,是指类似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所习惯使用的以经验观察、科学实验为基础的实验化和实证化方法。这些方法当然也会使用抽象方法,但是它们的抽象方法是和事物大量的具体规定性结合在一起的,就像自然科学总要充分结合大量的观察数据、实验数据那样。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的过程虽然要借助众多的实证数据——其实马克思自己也经常收集、查阅各国经济数据,但是当我们要“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时候<sup>[4](10)</sup>,即把握众多“经济形式”的本质规定性的时候,就要在思维中以“抽象力”这种抽象方法“代替”那些仍然结合着“经济形式”具体规定性的实证化方法。简言之,《资本论》的抽象方法是在纯粹的本质规定性层面——而非结合着大量具体规定性的层面——来把握“经济形式”的思维方法的,是对“经济形式”的纯粹本质的把握。那么,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展示抽象方法的使用的呢?这就需要回到《资本论》的商品分析及其价值的阐述语境中予以具体考察。

《资本论》以商品分析作为正文开端,而商品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sup>[4](88)</sup>。商品可感觉的一面在于商品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能

够以其物理形态或化学形态表现自身的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sup>[4](47)</sup>。对商品可感觉一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继续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等问题，如不同的具体商品以及商品背后的具体劳动有着一眼看上去便能够区分的感性差别。它们都是在特定形式下进行的，有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劳动形态、劳动对象、操作方法和劳动结果。这些方面的研究活动主要运用经验考察、实验方法、实证方法等与商品的具体规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商品“可感觉”的一面，而在于理解商品“超感觉”的一面。马克思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资本论》“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sup>[4](8)</sup>。《资本论》的“价值形式”之所以难懂，就在于抽象方法所把握的商品价值形式具有价值对象性，而没有一丁点经验观察、实验方法所依赖的使用对象性，这就要求抽象方法是在商品价值这一“经济形式”的纯粹本质规定性的层面上使用的。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其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sup>[4](90)</sup>所谓使用对象性，是指任何一个商品及其背后的具体劳动都具有明显可见的外观形态，都能够与其他商品或具体劳动对比而看出区别。如生产小麦的劳动和编写程序的劳动是一个小孩子也能分清楚的两种劳动，这些不是《资本论》抽象方法的用武之地。所谓价值对象性，是指抽象方法所把握的抽象劳动及其价值形式纯粹是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才能成立的，即抽象方法不仅要把握住不同具体劳动的完全等同性——劳动的体力和脑力耗费具有等同性，而且要把握住任何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均是社会化的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抽象劳动具有等同性或同等性，因此完全不同的具体劳动可以在它们均是抽象劳动分工体系之一部分的意义上进行相互交换、相互衡量和相互换算。要把握这些内容，就要在思维中“舍弃”商品的使用对象性等具体规定性，而抓住不同商品的“社会等的价值对象性”。正是在马克思所指出的“它们的交换中”即具体劳动

相互交换的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抽象方法才能够把握各种具体劳动内在的等同性和同等性。这种等同性和同等性完全是社会意义上的，需要运用抽象力才能加以认识，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观察、实证的物理或化学原子的因素。

就此而言，《资本论》运用抽象方法进行的价值分析，舍弃或“代替”了经验观察和实证方法，真正把握住商品及其具体劳动背后的共同的本质的规定性，即抽象劳动及其价值形式，由此实现了对商品问题的“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考察。正是抽象方法的科学运用，使《资本论》的价值分析不能混同于商品分析。作为《资本论》之方法起点的抽象方法，体现于《资本论》关于商品的“超感觉”的价值分析中，而不能笼统地被判定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可感觉”和“超感觉”的商品分析中，即《资本论》的分析起点和方法起点并不是同一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社会历史条件给人们提供的运用抽象方法的客观基础。抽象方法不是像“具体上升到抽象”那样的思维进程，似乎只要通过整理和归纳各种商品及其具体劳动就能够得到抽象的等同性一样。“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始终建立在商品经济的特定的发展进程中。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分工体系的发展，使得各种商品及其具体劳动能够表现为抽象的物，即货币。这就表明任何具有感性区别的商品，任何一种私人的具体劳动，都已经转化为抽象的、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都能够在量化指标(货币)所构成的体系中开展相互评价和衡量。只有在满足了这一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抽象方法才能够根据商品的货币表现来“反向地”确定商品价值形式的存在，“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sup>[4](93)</sup>。也就是说，抽象思维只有站立在历史的“完成的结果”上，才能回头去追溯商品的抽象劳动及其价值形式。不难看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抽象方法是从商品的价值分析(而不是商品分析)开始体现的。理论体系的分析起点和方法起点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并不等同，这是我们对抽象方法与《资本论》

的起点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后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 二、两种抽象方法：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抽象方法的批判

商品的价值分析是古典经济学就已经开启的理论进程。马克思曾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古典经济学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道路，相应地其方法也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在“抽象上升到具体”和“具体上升到抽象”的两个方法中，都出现了“抽象”方法，而且马克思关于两个方法的叙述也是前后相继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sup>[5](42)</sup>。这很容易使人认为“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方法，正是“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所得到的结果，即抽象，同时又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起点。那么，这两个方法所蕴含的抽象方法究竟是不是同一的呢？我们的回答是：古典经济学“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方法，并不能够直接成为《资本论》“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准确地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抽象方法，只有在经过马克思的批判性改造之后，才能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

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家经过对人口、民族、国家等的整体研究，最后得到了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sup>[5](41-42)</sup>。既然古典经济学家运用抽象方法得到的是抽象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抽象方法还不是《资本论》“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使用的抽象方法呢？原因在于，古典经济学家得到的抽象关系包含很多非抽象成分、非科学成分的不纯粹的抽象规定，使得马克思必须要对这些不纯粹的抽象规定作出一定的改造之后，才能够纳入他自己的方法论和理论阐述之中。以价值为例，古典经济学家关于价值问题做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一是区别了商品的两个要素，即商品包含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揭示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客观基础和物质前提。斯密提出：“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

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sup>[6](25)</sup>将商品的两要素界定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贡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进一步提出，使用价值虽然不是决定交换价值的因素，却是交换价值的前提，“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sup>[7](7)</sup>。实际上，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来看待，这是古典经济学家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得出的重要结论。二是揭示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斯密的《国富论》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并且始终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纠正了重农主义者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从而在抽象的意义上正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sup>[6](26-27)</sup>。这里的“辛苦和麻烦”正是劳动的不同表述方式。之后，李嘉图揭示出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高度抽象的规定把商品的价值分析推进到古典经济学范围的最高点，成为马克思分析商品问题的理论基础。

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得到的价值、交换价值、劳动等抽象规定，虽然达到了“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的极限，但是它们仍然没有实现科学意义上的抽象方法，因此就不适合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古典经济学家所得到的抽象规定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很多情况下还保持着具体和抽象相混同的弊病，主要表现在他们从未在理论上正确地区分开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表现，从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例如斯密没有区分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他写道：“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sup>[6](26)</sup>，而作出的结论却是：“对于占有

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sup>[6](26-27)</sup>在斯密那里，究竟是生产商品付出的劳动还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是一个模糊不清、在理论上忽左忽右的问题。同样，李嘉图也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的表象中抽象出来。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规定的非彻底性、非科学性，尤其是关于价值问题的相互冲突观点的存在，他们的抽象规定所得出的抽象方法就无法成为《资本论》“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抽象方法。

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抽象规定，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从而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进一步把商品看作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把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决定因素，把交换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因素，从而实现了科学的商品价值分析。由此可见，《资本论》所强调的抽象方法，本质上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正确与错误成分交错、模糊与混淆重叠的产物。这是我们理解“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方法时，需要把握的表述同一性与内涵差别性问题。总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具体上升到抽象”中的抽象方法作出了批判性改造，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才确立起“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方法以及抽象方法的科学性质。

### 三、由抽象致具体：从单一规定到“许多规定的综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非常明确地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界定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sup>[5](42)</sup>，却始终没有对“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做出科学性上的界定。现在的问题是：马克思只对其中一个方法作出了正确性的判定，而对另外一个方法没有做出类似的判定，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认为“具体上升到抽象”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认为马克思吝嗇笔墨是没有说服力的，而对这个问题学界的研究还存有一些模糊的方面，需要仔细辨析。

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指认“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而对“具体上升到抽象”没有类似指认这一现象，认为马克思的未阐述在实质上判定了“具体上升到抽象”是错误的方法。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未能把握马克思论述的本意，是将马克思没有的观点附加到马克思身上。只要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观点和方法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马克思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大量理论观点，那么就不能断言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是错误的。与此同时，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阅读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学习、掌握和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例如，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起点的确定就经历了抽象、资本、货币等多种规定，这些正是马克思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所得到的不同阶段的理论成果。如果把“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看成是错误的方法，那么就会把马克思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看成非此即彼、内在割裂、相互分离的过程，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思想成长的本来面貌。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的理论性质呢？我们认为，“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正确性并不天然地表明“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是错误的。至于马克思没有判定“具体上升到抽象”方法的科学性质，更不能成为这一方法是错误的证据。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仍然有待于提升和深化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如果这一方法论进展过程不完成，那么“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就是不充分、未完成的方法。源自黑格尔哲学、成熟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观点便是：探寻事物本质的真理，绝不是对事物的单一规定、单一本质的简单把握，而是对事物的规定之综合、多样性统一的整体性把握。如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就内在遵循着一种从具体走向抽象，再从抽象走向具体的鲜明特征。具体而言，《精神现象学》的道路是从具体走向抽象，即从“感性确定性”这个最具体、最具感性丰富性的范畴逐步走向最抽象、剔除了所有感性成分

的绝对知识。对于“感性确定性”，黑格尔提倡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加以面对，“感性确定性”原本是怎样的，就按照原本的样子完整地、直接地接受，而不掺杂任何“概念的把握”和抽象的规定。及至“感性确定性”经历重重环节将自身的抽象规定完全“蒸发”出来之时，即以绝对知识的面貌再次复归自身之时，“感性确定性”已经化身为没有任何感性成分的纯粹抽象的概念，这可以说是黑格尔哲学体系所展示的“具体上升到抽象”的理论进程。在此基础上，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所展示的就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程，即《精神现象学》的终点实质上就是《逻辑学》的起点。当然，这不是说作为《精神现象学》终点的“绝对知识”直接地就是作为《逻辑学》起点的“纯有”，而是说“绝对知识”的没有任何感性成分的抽象规定性就是“纯有”的全部的规定性。就抽象的规定性而言，两者是等同的。在《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体系中，黑格尔展示了“纯有”这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抽象概念如何外化出自身，然后又复归于自身，从而成为最丰富、穷尽了全部规定性、作为“多样性的统一”的绝对精神。这正是“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虽然批评黑格尔把“抽象上升到具体”错误地理解为实在“本身的产生过程”，但是仍然肯定地指出了黑格尔所使用的“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sup>[5](42)</sup>。也就是说，“抽象上升到具体”并不是事物的存在论的生成方式，而是人们面对事物的认识论的把握方法，而且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把握方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4](10)</sup>。为了完成这一最终目的，马克思充分吸取了黑格尔哲学所使用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内涵和方法精髓。其重点工作不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单个的抽象规定，不是运用抽象方法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孤零零的断言，而是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理论上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重规定所构成的完整整体。这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抽象规定”在思维过程中实现的“具

体再现”。只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重的抽象规定，经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面貌才能呈现在人们眼前，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sup>[8](42)</sup>。正是在此意义上，按照“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表象”揭示出的“抽象规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整体中的某个层面、某个片段，而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

借用恩格斯评价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表述来说，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所达到的抽象规定，“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sup>[8](540)</sup>。单一的抽象规定在相当广泛的认识领域中是合理和必要的，因为它们是人们认识事物的重要节点，没有这样的认识节点，人们认识事物的思维成果就会缺乏基本的单元。但是，如果停留于这样的抽象规定，不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那么“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所达到的抽象规定只是一个一个的片面规定、狭隘规定，它距离事物的整体性的本质仍然遥远。因为抽象规定只能“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sup>[8](540)</sup>。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所达到的“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还是马克思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所揭示的抽象规定，其科学性质表现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研究历程中的阶段性的认识节点，这些节点是人们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成果。如果这些认识成果被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终观点，而没有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中的方法起点，那么“具体上升到抽象”就无法成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而只是一种科学上不充分、不彻底、无法完整把握事物真理的方法。就此而言，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改造古典经济学家运用“具体上升到抽象”所达至的抽象规定之后，在充分借鉴黑格尔哲学所展示的“抽象

上升到具体”的理论体系之后，才将“抽象力”这种抽象方法真正地发展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由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考察。

#### 四、重释《资本论》抽象方法的当代启示

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语境，深入考察《资本论》的抽象方法及其意蕴，对于推动《资本论》研究走向整体性，夯实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方法支撑，为科学认识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提供理论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方法论研究的完善和成熟是《资本论》研究进一步推进的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终其一生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理论容量最丰富、思想地位最重要的著作，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研究水平就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标尺。相比于《资本论》的理论内容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论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我们认为，包括抽象方法、“具体上升到抽象”、“抽象上升到具体”等在内的方法论研究正是《资本论》研究拓展领域、深化视角的合适的切入点。考察《资本论》所使用的抽象方法等方法，不仅能够澄清以往《资本论》研究中一些模糊的认识，而且可以透过抽象方法来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的内在联系、方法边界及理论贯通。这将有助于学界从方法论的视角来深化《资本论》研究，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二，《资本论》抽象方法所体现的方法论原则，是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体系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sup>[9][8]</sup>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引领作用，其重要的前提性工作便是强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抽象方法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对古典经济学方法的

改造推进、对黑格尔哲学方法的批判性继承等。马克思从来不是现成地从古典经济学中拿来某种观点，也不是无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的某种方法，而总是以彻底的批判态度、严格的科学精神来考察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所运用的观点方法，以辩证扬弃而非拿来主义的方式吸取包括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人类思想文化成果，从而使得《资本论》这一著作具备了深厚的思想蕴含和强大的真理力量。这就启发我们，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和重要结论，而且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种观点和结论所据以提出的方法，在方法研究和思想研究的结合中，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第三，《资本论》抽象方法的重新解释是科学认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必要理论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sup>[10]</sup>。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已经持续多年，不过对于如何认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本质规定、重要功能和规范路径，仍然是我们需要不断认识、与时俱进开展探索的重要命题。资本既具有逐利本性，有可能出现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就要运用抽象方法来揭示资本的“抽象统治”，又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功能——因此就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辩证、发展地认识资本的历史作用。就此而言，对《资本论》的抽象方法进行解释和研究，有助于在新时代正确区分资本的不同层面及其作用，科学把握资本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定位，从而为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 注释：

- ① 如有学者指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参见罗雄飞：《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1)：178-211。有学者认为《资本论》第



1卷的起点是较低级抽象阶段上的简单商品流通。参见 R. 黑克尔、张贤佳:《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起点的争论:简单商品生产还是简单商品流通》.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7(3): 96-99。

### 参考文献:

- [1] 伊利延科夫. 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M]. 郭铁民, 严正, 林述舜, 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6.
- [2] 黄志军. 为什么马克思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一个学术史的考察及启示[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5): 42-48, 174.
- [3] 吴晶晶.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试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J].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 2018(4): 72-82.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7]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10] 习近平.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 2022-05-01(01).

## Reinterpreting abstract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Das Kapital*

BAO J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Marx's identification of "the abstract rising to the concrete" in the 1857—1858 *Economic Manuscripts* is the "scientifically correct method", and the key issue is how to understand the "abstract" method in "the abstract rising to the concre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as a way of thinking to grasp the pure essence of "economic form", the abstract method is not reflected in the commodity analysis in *Das Kapital*, but is typically reflected in the value analysis of commodities in *Das Kapital*.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goods, Marx transformed and promoted "the concrete rising to the abstract" derived from classical economics, which truly realized the abstract method in a scientific sense.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method also comes from Marx's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Hegel's philosophical method. This critical inheritance indicates that the theoretical process of "the concrete rising to the abstract" still needs to be advanced, enhanced, and deepened into a method of "the abstract rising to the concrete". Exploring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bstract method in *Das Kapit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en the study of *Das K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consolidates the methodological support of the academic system of Marxist theory,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Key Words:** *Das Kapital*; abstract methods; "the abstract rising to the concrete"; "the concrete rising to the abstract"

[编辑: 胡兴华]